



第三期
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

游戏的结果是打击他们的尊严和道德感，毒化同伴之间的气氛，并以此转移对专制权力的抵制。郭、曹及“X小组”的年轻人显然不谙生存策略，结局是“人仰马翻”，家破人亡。

极权制度鼓吹绝对斗争，扭曲了人性，毒化了社会气氛，破坏了人伦和道德的基础，在人与人之间，在朋友、恋人和亲人之间，散播怀疑、不和与仇恨的种子；存善心、讲真话都成了罪恶的渊藪；在严酷的“道德主义”的表层下，正常的社会行为规范——道德全面瓦解。在高层，经过残酷的权力斗争之后爬上高位的人，大多是几起几落、伤痕累累，心理与道德残缺不全；在下层，人们互相防备、互相监视、互相揭发，狂热和冷酷交织，“与人斗其乐无穷”，“整人”和“被整”成了家常便饭……所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并不是什么突发事件，而是这一局面合乎逻辑的结果。

揭露、批判和否定文化专制的本质，是建立社会道德的先决条件，若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，所谓“以德治国”、“以德育人”不过是鼓励虚伪罢了。人称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”，比如那些贪官，在被戳穿之前都高谈“廉政”，在被戳穿之后都声言“辜负了党教育多年”。

周国平《岁月与性情》出版后，曹天予以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，后背上赫然涂着“告密者”三个字。曹天予以为，周文乃无中生有的谣诼，愤慨之余，写下辩诬文章。

曹天予究竟是不是“告密者”，他在自辩文字里作了回答。而我们感兴趣的是，与青春和友谊一起埋葬

**编者的话：**曹天予先生的回忆文章《不应被遗忘的历史》，大量引用了前几年母校——北京大学退还的当年他被打成“反革命学生”的“罪行档案”。其中包括他被隔离整肃期间的交待材料，以及往来书信、日记、笔记、文稿等等。透过这些文字，我们似乎回到了那个严酷的年代，看到一伙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因共同的压抑和苦闷走到一起。他们试图以贫乏的文化资源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寻找人生的意义。他们的思考方向不尽一致，但都反对极权主义，都追求个性解放、民主、自由和人道主义等人类普世的价值。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里，这就是大逆不道。他们遭到了残酷的镇压，结局是悲惨的。其中大部分人遭受牢狱之灾，郭世英最后死得不明不白，留下了一段悬案。曹天予当年的文字对我们认识那段历史和专制极权的本质，无疑有着特殊的价值。

四十多年前，那伙年轻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足以令人称羨，具备了诸多美好的因素：青春、才识、友谊、爱情、读书、探索、追求……本该留下终生的友谊和美好的怀念，却种下了疑忌和怨恨的种子。其实，在这个国度里，类似的故事反复搬演，郭世英、曹天予及“X小组”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例。在正常的条件下，年轻人在交往之中即使有冲突和矛盾，也不过导致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或者顶多是分道扬镳。但在郭、曹及“X小组”的事例中，每个人都被逼至要进行无奈选择的地步：要么屈服忏悔、坦白交代，要么毁灭，甚至屈服忏悔也不能免于毁灭。

极端的权力一向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，激起人们的希望、恐惧、仇恨，让人们互相猜忌，互相戒备，互相叛卖，而最有效的一招是通过透露某种信息进行挑拨，让“小团体”自己去玩寻找“害群之马”这一

的还有什么？朱学勤写过一篇《思想史上的失踪者》，以纪念那些夭折了的思想。透过曹天予的文字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思想的来源：黑格尔、青年马克思、卢卡奇、罗素、实证主义、异化、人道主义；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、陶里亚蒂和多列士……只是在近二十年后，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中国的思想界才重新接续这些失落的话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们可算是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思想解放的先驱。从另一方面讲，他们又是五七年右派言论的继承者，是那些反叛声音的余绪。

那一时代，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、匈牙利事件、反右、大跃进、三年“自然灾害”、庐山会议……真相被一点一点地披露出来，历史以延迟的方式在这些年轻的头脑中激起强烈的反响。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消息：党内“改革派”在推进“非斯大林化”，总有一天会有变化……总体而言，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，但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：手无寸铁的预言家最终失败。对年轻的心灵和头脑而言，封闭而压抑的现实生活简直不可忍受：一方面，谎言和虚伪无处不在；另一方面，僵硬乏味的意识形态容不下哪怕稍微丰富一点的思想感情。形势并没有像他们估计的那样好转，反而急转直下，越来越糟。这是一次精神突围的尝试，其最鲁莽的行为是出“X杂志”，最绝望的表现是“偷越国境”（这次行动完全没有悬念，还没开始就夭折了）。

四十多年过去，他们的思考被前尘覆盖；他们的预言有的已被历史证实，有的仍有待证实，这些都自不待言。在思想“体制化”和利益化的今天，他们勇敢的探索 and 求真的精神、他们非功利的精神追求仍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郭、曹及“X小组”事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，当年那些激进青年的灾祸特别是郭世英之死的根源，在今天已经不言自明了。然而，那个寻找“害群之马”——告密者的游戏仍然在继续，它出现在各类小报的报端。不过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严肃性，已经变得使人“喜闻乐见”。“反革命小集团”案件变成“寻找告密者”的游戏，最后沦为媒体竞相炒作的卖点，正好反映了时代的变迁。注意力又一次被转移，最初的反叛和沉重的命运被解构为大众娱乐的要素。在一片关于琐碎细节的争吵中，我们又窥见当年那位“青年导师”的身影，他的观点并无改变，还是那样“正确”，让我们不禁产生了怀疑：这世道究竟变了多少？

因版面有限，我们对原文进行了删节；又因作者在国外，所以未经其审阅。若要引证，请根据原文。

## 不应被遗忘的历史

曹天予

9日晚，与郭一起去张家。谈了哲学，争论世界可知性问题。

11月14日，郭：你应该争取留学深造。我苦笑道：那不可能。他：为什么？我：我父亲是反革命。我为何五九年考不上大学，难道你真的相信报上说的是我成绩不好？郭愤慨之情溢然而露[我父亲是在中药铺里抓药的的店员，仅因与店内支书为小事争执，1953年以历史问题（加入过国民党时期的工会）定罪，管制一年。他不服，给宋庆龄（他曾听说宋主持过“中国人权保障同盟”）写信上诉，竟以历史加现行反革命罪于1954年被判处徒刑。1960年，病饿交加，在远离家人的农场里孤零零地死去。1987年8月31日上海高级法院对该案复查后“撤消判决”、“宣告无罪”。至此，这一夺去我父亲盛年岁月（他被捕时仅35岁）、给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带来无穷苦难的冤案，终于得到昭雪——04]

郭给我送内部书刊来，还盗窃了家里的密

对于曹天予的种种点名和不点名的指责，诸如“利用-出卖朋友”、“热衷于攀附名流”……已流传有年。我始终未置一词。因为没有时间和兴趣。感谢周国平先生“自传”，逼迫我翻检尘封多年的档案。

所谓“档案”，是指1964年北大“反动学生曹天予”专案材料。几经周折，它们终于在1985年秋被退还。

这总计百余万字的材料中，写于1964年8月的一份“交待”，内容比较集中。这是政治高压下的“低头认罪”，强权威逼下的“彻底坦白”。对周书所涉若干故事，诸如郭世英、曹天予在1962年9月至1964年2月间的关系；曹给郭沫若两次写信；曹在X小组案发中的作用；郭曹1963年5月18日后两次见面情况，亦有明白翔实的记录。

现依原文，将这份“交代”摘录如下（引自档案中其它材料以为补充说明者，皆置方括号[ ]中；笔者今注则用楷体并标明“——04”）：

[1962年]9月10号，看到郭世英，立刻判断，这是个自命不凡的人。我当时蔑视他。

又过了二天，我只当不知他是郭老的儿子，骂开了：昨天有一足球队员来找郭老的儿子。

这种权贵出生[身]的，总会有人上门奉[逢]迎。他脸红了[1962年招生政策改变，我得以上北大。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。我因此收到了很多来信。到北大后，趾高气扬，看不起人。——04。]

我越是不理他，他越是想找我聊。到九月下旬，一次下午上课，我拿出自己的“黑格尔美学初探”在改。他借去翻翻，下课时说他带回去仔细看。十月初，两人关系亲近起来。

62年11月7日，郭约我散步。我先骂系里教条主义、无知，他对我骂起他母亲，又引申到整个高级干部，骂他们等升级、养尊处优。我听了表示不可思议，但内心却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：认为政治生活的僵化已病入膏肓；恐怕[苏共]二十大一类的事要来了。郭问我愿不愿见一位朋友[指张鹤慈——04]。

件给我看（我对郭一直说，苏联情况到底是否是修，想研究一下），是苏共中央反斯大林的文件。……又骂他家里母亲教条极了，令人压抑死了。我则要他理解作母[亲]的好心，原谅她的啰嗦。

62年11月23日晚八点多，郭告诉我，他一个朋友[孙经武——04]从军队里出来了。接着就告诉我他[指郭]以前送人越境叛国，孙经武为此进军队改造。[又说]现在把傻子当作理想来提倡，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。我笑笑：人道主义要把人培养成聪慧的智者。这是要他“认清”我的马列主义与党的不一样。

郭又告诉我：孙在学校公开宣扬三和，反对全民皆兵。第二天他问我，愿不愿与那个孙经武见面。11月25日，下午一时许，我上郭家。我与他[们]大谈人道主义，骂现实的学术空气为教条，后来谈中苏分歧。郭赞成赫[鲁晓夫]的三和。孙张也是。

12月初，我上郭家几次。谈西方哲学、看画、骂过党虚无主义，并直接骂过党支书不懂艺术、教条而虚无。

那时我就想把郭与方[小早]拉在一起。我对郭称赞方聪明之类，想使郭对方感兴趣。对方称赞郭有义气，以前送人出去（即叛国）、为人真挚、有情意。使方很崇拜郭。

到十二月十四日[晚上]，郭来找我。说父母与他谈起（北大汇报的）他的交友情况，不让他与我来往。郭哭了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，这都怪我，我原该知道身份，不与你来往的。他：他妈的，我还算人吗，连交个朋友都不允许了。我：我今后也不可能有什么出路。再读书也无聊，我退学回家吧。咱们俩好了一场，也算了吧。他：不行。你要回家就完了。既然学校容不得我们在一起，我退学。我退了，还有办法。咱们仍然能来往。我还是不愿意。到了[半夜]二、三点钟，他提起让我给他父亲写信，以挽回一下，说：要是我父亲赏识你，那就行了。我一听，心动了。

[64年8月6日交代：“62年12月14日夜郭告诉我父母不让来往，使我对学校、对档案制度痛恨极了。我给郭沫若写信时是满腔愤恨，挑剔、挖苦、嘲笑、谩骂，应有尽有，越写越不讲理。这信根本不是求赏识的，以至郭世英问我：你目的何在？他原希望我能使他父亲赏识，但没有一个求赏识的人像我那样写信。”]

63年1月10日左右，他父亲来信（给他的），其中劝我相信组织，不要猜疑，还要我们把字写清楚等等……

[63年]1月16日上午，郭送我回家。我回家后，二十多天通了四封信。我写信说要不回校念书了（怕反修）。他表示同意 [说]他暑假来看我。

2月中旬，我急忙回来，因为我怕郭一下子爆发，被组织知道。2月17日上午，郭来车站接我，告诉我几件事：1、一月下旬，他父亲与翦谈起我的信，并给翦看。问翦感想。翦反问。郭答：有些像我们年轻时。翦问郭世英：他什么出身。世答：他父亲有问题。翦：可惜时代不一样了。现在这一套不行了。2、说他想搞一个X小组。我吓一跳。他告诉我先有张、孙，也把我算在内。性质是搞无政府主义（不过他讲的并不是欧洲的无政府主义，而是内部组织方面不立负责人之类）。名字叫X小组，表示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。

我听他讲完后，就说了：（1）何必搞名称？（2）不该谈创作与政治。只谈学术。一谈艺术，与政治就容易沾边，危险。（3）出刊物太危险。尤其不能印。又说：这种事本身是很令人向往的。但太危险。我：别搞这种组织行不行？郭：不，我想搞。生活太苦闷了。我：你实在要搞也可以。但是，不谈政治，不搞文艺，只搞学术，别印东西。他：你写学术也行。张他们要搞文艺。不过我可以说服一下试试。我：我写不写还是以后再说吧。他：怎么，你不干？我们都等你回来2月20日成立，出第一刊物呢！我当时表示犹豫，说，先看看他们写的东西再说。

2月18日中午，郭与张来找我，要我表态。张尤其凶，一定要我参加写文章。我要先看看他们写的东西。张反对：你想写评论，定调子，那不行。大家平等，各人写自己的。我：不愿让看算了。我写不写还需斟酌。

郭问起我，方小早如何？我一口否定了。等张走后，郭：干脆你出来领头干。我拒绝了。

2月19日中午，张郭又来催了。我还是犹豫不定，说这事太危险。我：你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呢？郭：活跃思想、丰富生活。我：那自然可以。但何

必搞这个？张：我还要扩大社会影响。我：那马上把你抓进去。张：抓进去也不怕，只要能发生影响就行。我：我马上去报告组织，免得你真去干。张：那你也跑不了。你的话，我都在日记上留着呢！出了事，就咬定你是主使者。你父亲与你的野花会帮你忙的[父亲事已如前述。“野花”指1957年上中学时我筹办的一个学生刊物，为此被公安局拘讯一天，后遭全校批判——04]。张使用威胁手段使我很火：我不干就不干……郭劝架。我愤愤地走了。

晚上我告诉方[小早]X小组事。我：这种事是很吸引人，但太危险了。可不参加郭又要伤心，对不起朋友。你说怎么办？方：这事很麻烦。他要让我参加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。但是你不能干。他们有后台。出了事没问题。你可不行，家里又不好。提起家里的事，是我下不了参加决心的很重要原因。方：何况，陈老师[党支部、班主任——04]嫉妒你，他吃政治饭的，不懂学术。你有才能，弄点成绩来堵堵他的嘴。别跟他们[指X小组成员——04]混在一起。

20日中午，郭来找我。我把决定告诉他。他很失望。但想了一会，说你不参加也好，可以不分散精力，集中精力搞学术。我也很矛盾。既想叫你参加，又怕让你参加，免得以后拖累了你。我：我还是想搞学术，不想干别的。又劝他别搞。郭：生活太苦闷，你就让我干一个时期再说。到下午一点多，郭要去张家开成立会，让我去与他们说一声。

开“成立会”轮流表态。（共五人：孙、张、郭、叶、我）我表示我不参加。张火了：不参加你来干什么？我：那我走。张：你走也不行，你是幕后军师。我：那我先去交代（当时弄僵了）。我后来又说：我只希望你们出了事别连累我，我不会检举。张也表示这可以，说：把你牵出来，我们也没好处。事实上订了攻守同盟。那晚，我又几次要郭放弃。郭不听。

21日中午，郭与方来看我，我说，我想给总理打个报告，请他允许我出国看看。他们笑我做梦。

（2月18日在蔚秀园西，我曾谈起快反修了，我回学校很危险。张：那你为何又来了？郭：是来看我的。郭当时十分感激）。

张说要到钢院去，把窃来的总理在军队会议上的报告（未发表）内容漏给我们：主要是要抓阶级斗争、抓政治工作、禁止外国书籍电影入口、抓民兵训练等等。郭听后很敌视：但愿老天爷帮忙，别再来三年灾害。我笑了：问题不在老天爷，我对前途是乐观的。张恨恨地说：有什么可乐观的？我：这样干，矛盾会更尖锐化，也就更接近解决了……教条主义者不接受教训，到头来，矛盾紧张，中央会有人出来解决。（暗指亲苏派得势）。陈毅不就是想解决这一类矛盾，做过试探吗？张：你说的有道理。但恐怕你等不到了。我：那又有何妨，只要社会向前进了就行了。这是我向他们发出过的最露骨的变天幻想。我幻想这将会使社会上抗议阶级斗争不人道的呼声上涨。

2月底，“评多列士”出来了，3月初，“再论陶里亚蒂”出来了。反修形势明朗，我恐慌了。我写二信给郭，说我们两人分歧太大，他受资产阶级影响太深等等。要他晚上早回校，别出事。

3月11日上午，郭问：你真想出国吗？我：当然，但这事太虚幻。他谈起自己想自杀，能自杀而不死，进医院休养几年。我说我也想回家休息一段。最近深入反修，我可能挨斗。

当时郭说他有枪。我说，你打我一下，可以打右胸，我就可以休学了。

[64年10月交代材料：“3月中旬，我与方逃课。陆平也知道了，打电话要追查。方说要到处流浪去。我说，咱们一起去。4月4日，在作走的准备时，又放心不下郭，写信给郭沫若，让他预防郭世英出事。”]

4月4日给郭沫若写了一信。说要找他谈几件事。当时企图是：（1）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；（2）表明自己一贯想拉他摆脱张影响、让他搞马列主义。（3）家里应设法让他离开张。

不想郭与于看了后交给了郭世英（这是我后来先从张母亲那儿，后又从于立群那儿听来的），他一看对我就冷淡了起来。

4月19日中午，郭告诉我，他给我写了好多信，都撕了。我要他乐观些。

4月21日、4月22日，我见郭与张一直在一起。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，于4月23日把郭的书籍和信全还给郭，以示绝交。郭的脸色白了。那以后，郭成天不在校。

5月6日上午见郭，他一付醉鬼样。我心疼又

急，立即打电话给于立群（工作人员接），让接郭回去。

第二天组织要找我谈。我赶紧打电话找郭商量对策。郭不在家。我上张家一找，遇见了。我一看郭完全被张控制住了。刚出张家遇周国平。[64年8月交代材料：“他（周）告我他们想走，他急死了，怕郭出事。我没想到事态已如此严重。极其紧张。”]一商量，上郭家去找于立群。我提出：不要动郭世英；把事情悄悄解决。她要我不要顾及友情、应检举郭。我说，要再争取郭，让他有可能主动。于答应我再去找一次郭。关于最后一条，她说不能绕过学校，要我与周向学校检举。

5月8日约好我晚上向组织交代。中午我上张家去找郭。我与郭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要他回学校念书，向家里讲X的事。周也来了，约好第二天我上郭家去。我又尽力控制周，不让周去交代，说好陈老师一找他，他就向我说情况。

[64年8月另一份材料：“当时我大量利用周国平，让他把陈老师意图告诉我，用他来加强争取郭的力量，与他合力拉郭回校。我对周说：‘一切目的全在救郭。企图外逃责任全在张。’周国平是受了我的害的。”]

5月9日中午，陈老师不让我去郭家。下午郭与周来找我（张似乎也来了）。我问上哪儿？郭：上张家。我不干，回头走了。回房间，一想郭完了，大哭一场。陈老师知道了，把我叫去，要我去张家。我走到半路，周来找我，说张他们在烧东西了。我急忙赶去。我要他[指郭——04]把一切告诉我，约好12日他告诉我3月后的一切事情。

10日下午，组织第一次找我[有陈、北大党委人员、公安部人员——04]，要我谈看法。我把张说成很反动（这是事实），但为自己和郭开脱。说郭是糊涂、受张支配。组织问我：是否开始时郭对我有企图，后来我不愿参加X小组，他们失望了，离开我？我否定了，说郭起先是想与我谈美学。后来是我与他分歧大，我不与他来往的。但也有可能有张在指使。关于方小早，我的回答方不想参加X，他劝我别参加，因为我出身不好。后来，方恨我，认为我陷害了他。其实我的目的是保护他，但没有想到反而把他牵了进来。

5月17日中午，郭又来找我。张、孙也一起来。上课时，郭找我说话，我避开了。第二天上心理课，我看郭来，不睬。中午，他被带走了。

5月20日组织要我交代。交代完出来等方与周。方出来（海淀分局）向我讲了他交代的情况，其中有嘲笑[审]问他的人的事。我问他如何交代我。他说我是一心搞美学的。上面要他讲我写过的东西，他就讲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等。上面问他要政治的，他说没有。我：你与郭的关系，可以推在我身上，说只因我的关系与他玩过几次。这样，方对我的不满也就消失了。

对于周，我利用他对郭的感情，要他也包庇郭，为郭开脱，让他说，是张坏，害了郭。

[64年7月30日交代记录稿：“（63年）7月25日，郭世英来校，他已转变得很厉害。我觉得自己更孤独了，也产生过要进步的念头。”]，[64年9月交代材料：“7月25日郭来校。谈了一个多小时对错误的认识。我给他看了5月29日信，他似有泪水，但终于冷冰冰地说：‘咱们以前不一样，现在还是不一样。’这是在划界限。他走后，我又给他一信，很短。内容可能有‘自己也觉得该改造了’之类。”]

64年2月除夕他回校。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我问他怎么堕落的。他没谈几句，有人叫他走，未听下去。那天他问，听说你的“人道主义”已写完了。我说没有。基本观点都动摇了，很难写下去。他：我认为党是最人道的。我：我并不认为党不人道。我研究的是一个玄学的问题。即什么是人道主义。（企图掩盖自己的反动本质）。此后，无来往了。他的改造情况，我从班主任那儿也听来一些。知道他已经恨我了。

[64年9月交代材料：“64年2月12日，郭世英来校。我去看他，心里很矛盾：不知他变了没有。他对我抱有敌意。心里很难受。也有些想改造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变的，以及他怎么堕落的，他对我讲了些。也讲了要进步，必须靠拢组织、彻底交代。我虽然相信他的话，却做不到，反而觉得人们全把我抛弃了”]

在周笔下，曹怎样巴结—利用—出卖郭；又怎样充当X小组事件告密者，说得煞有介事，绘声绘色。故事倒也新奇，惜乎稍嫌离谱。

